

# 市场经济与 现代企业营运

主编 李卫东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营运/李卫东编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6

ISBN 7—5044—2370—X

I. 市…

II. 李…

III. 企业—营运学—中国—研究

IV. F2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9740 号

责任编辑:吴占文 巫皆富

责任校对:尹红梅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53 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报国寺一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公司印刷

\*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 11 印张 280 千字

ISBN7—5044—2370—X/F·1472

印数:1—3000 册 定价:12.80 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 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营运

|     |     |     |     |
|-----|-----|-----|-----|
| 主 编 | 李卫东 |     |     |
| 副主编 | 王有才 | 左其昌 | 刘星明 |
|     | 吕国华 | 任月勤 | 谭增同 |
| 执 行 | 孟永华 |     |     |
| 副主编 |     |     |     |
| 编 委 | 张宏臣 | 武树青 | 封志强 |
|     | 高鲜花 | 常 仲 |     |
| 执 行 | 温向明 |     |     |
| 编 委 |     |     |     |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 (1)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                   | (1)   |
| 第二节 我国计划经济的体制内裂变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性<br>定位..... | (6)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 .....                  | (19)  |
| 第二章 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 .....                  | (26)  |
| 第一节 市场和市场体系 .....                    | (26)  |
| 第二节 一般商品市场 .....                     | (34)  |
| 第三节 生产要素市场 .....                     | (43)  |
| 第三章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                  | (57)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 .....                       | (57)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的构成 .....                    | (64)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机制 .....                 | (75)  |
| 第四章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                  | (82)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宏观调控 .....               | (82)  |
| 第二节 宏观调控的对象、环节及手段.....               | (92)  |
| 第三节 宏观调控的层次与宏观调控政策.....              | (106) |
| 第五章 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                 | (122) |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br>.....      | (122) |
| 第二节 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和功能.....                | (125) |
| 第三节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 (132) |
| 第六章 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 (144) |
| 第一节 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 (144) |
| 第二节 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原则和<br>方法.....   | (148) |

|      |                       |       |
|------|-----------------------|-------|
| 第三节  |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内容····· | (153) |
| 第七章  | 现代企业制度·····           | (169) |
| 第一节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理由·····    | (169) |
| 第二节  |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      | (173) |
| 第三节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途径·····    | (185) |
| 第八章  | 现代企业的营运机制·····        | (197) |
| 第一节  | 自主机制·····             | (197) |
| 第二节  | 动力机制·····             | (201) |
| 第三节  | 约束机制·····             | (204) |
| 第九章  | 现代企业营运的决策与策略·····     | (212) |
| 第一节  | 现代企业营运的决策·····        | (212) |
| 第二节  | 市场预测与产品开发·····        | (220) |
| 第三节  | 市场营销策略·····           | (232) |
| 第十章  | 现代企业家·····            | (246) |
| 第一节  | 现代企业家的素质·····         | (247) |
| 第二节  | 现代企业家的风范·····         | (256) |
| 第三节  | 现代企业家的观念·····         | (267) |
| 第十一章 | 现代企业文化·····           | (274) |
| 第一节  | 企业文化的发展状况·····        | (274) |
| 第二节  | 现代企业文化的构成和效用·····     | (280) |
| 第三节  | 企业精神与企业形象·····        | (292) |
| 第四节  | 现代企业文化应具有中国特色·····    | (302) |
| 第十二章 | 发达国家企业营运·····         | (319) |
| 第一节  | 日本现代企业营运·····         | (319) |
| 第二节  | 美国现代企业营运·····         | (328) |
| 第三节  | 西欧现代企业营运·····         | (334) |
| 第四节  | 启示与借鉴·····            | (339) |
| 后记   | ·····                 | (346) |

# 第一章 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 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努力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懈探求的永恒性课题。在远古极其简陋的生存条件和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形成了最初的自然配置,发展绵延长达 7000 年之久;当生产进入了社会化、协作化时代就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配置,其后长期一统天下,持续不衰。直到本世纪初叶,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计划配置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就资源的配置效益与市场配置展开了激烈的世界性竞赛。

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果雄辩地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它创造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世界奇迹,在全球经济现代化的征途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计划经济历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实践,表现出这种体制内生的无法克服的重大缺陷,从而导致各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发展迟缓低效。由这种体制来完成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注定不能实现。

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结论。

## 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就是以其内在的活力不断突破区域封锁和要素封锁走向全面开放,以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过程,就是资

源配置的社会化程度由低到高演进的过程。从原始社会最初的自然配置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的市场配置,其间经历了从偶然的物物交换到普遍化的生产全要素交换,从部落边界的边缘市场到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漫长跨跃。在这一自然的生成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与各种超自然力量的顽强斗争和突破自身局限性的种种努力,在运行方式及其相应的理论指导上发生了明显的变迁,表现出层次清晰的阶段性,即市场经济的萌芽发育阶段、自由放任阶段、国家强制干预阶段和政府有限干预阶段,而且,在充满曲折的大跨度进程中也日益丰富和成熟了市场经济理论上的基本规定。

依据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作用的范围、大小及其相应的理论指导可把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市场经济的萌芽发育阶段。从原始社会偶然的物物交换到十七世纪中叶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诞生。在这一阶段,市场力量相对弱小,市场范围比较狭窄,整个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无论是市场区域的渐进扩大,还是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这就引出了人类最初用来调剂丰缺的物物交换,形成了最早的产生在部落边界的“边缘市场”。随着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出现,手工业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剩余产品相对丰富,使得交换频度大大提高,交换主体由单一的氏族首领扩大到氏族成员,交换地域也由部落边界扩充到部落内外,氏族成员之间开始进行交换,“边缘市场”就演化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市场”。到了奴隶社会,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和奴隶主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需求,商品交换就突破奴隶制国家的界限,使国内的区域市场发展为“国际市场”,但是,统治者对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作了严格规定,对非奢侈品的交换给予了很大的限制,这就使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强权的干预,阻碍了市场的发育成熟。到了封建社会,由于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多种物质资料的生产得到较大的增长,国内市场趋于稳定,生产所需和消费所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经济运行机制无情地扼杀了市场的活力,阻碍了生产力快速发展。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手工业有了急剧的增加,对利润的追逐和西欧人的冒险精神,使原有市场得到空前的扩充,各种市场大量出现,商业资本以不可抵御的力量促成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国家,为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竭力扶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扫除了封建主义的羁绊,为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的实现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市场力量对资源的配置在全社会起到了主导作用,从这时起市场经济就以其成熟的形态出现,完成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发育阶段。

第二,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阶段。从17世纪中叶市场经济的形成到20世纪30年代初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竞争。在充分自由的异常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实现了以电力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财富随之激剧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6页)

这一时期市场运作的理论基础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这一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以任何形式干预经济生活,主张放任自由的自主经营和自由贸易。它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商品生产者尽可能地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在它的指导下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自由经营政策。

在市场经济自由放任阶段,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得到空前的提高,国内市场包括各种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得到更完善的发展。国家忠实地履行着“守夜人”的职责,对经济运行不加干预。

第三,市场经济的国家强干预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危机开始到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滞胀”局面的形成。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在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一定的比例和结构协调运作,但是,各个企业在放任自由政策的引导下认定只有自由的竞争和自由的经营,才能更充分地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形成了生产的社会化要求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强烈冲突,从而导致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直到1929—1933年的那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对解除危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再也无法解决由它制造出来的体制性经济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作出有力的改造,就不能走出经济危机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宣告破产,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它首先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的神话,提出了解除经济危机的措施。这一理论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不是万能的,不能保证没有危机,只有依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实现“看不见的手”对“看得见的手”的让位转移,才能使供求平衡,消除危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各资本主义政府迅速制定了积极的干预政策,由国家直接投资,增加公共开支,提高政府采购力,并通过对资本家补贴、减税和压低实际工资来刺激、鼓励私人投资,私人生产,在与由它主张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的联手并行下,不仅有效地解除了经济危机,而且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到处一片繁荣景象,凯恩斯因此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

在这一阶段,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功能受到极大的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这一时期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日益紧密结合,形成了国私共有垄断资本、国私密切联系垄断资本和国有垄断资本三种形态,它们以跨国公司和集团贸易的方式在全世界营运。随着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经济联合体和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统一的世界市场日趋成熟。市场力量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

第四,市场经济的政府有限干预阶段。即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从本世纪70年代“滞胀”的形成开始延续至今。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的经济矛盾又日益增多并日趋尖锐,终于导致1973—1975年二战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经济陷入巨大的困境。凯恩斯理论也随之走到既无法解释危机,又不能解除危机的破产地步,贴着凯恩斯标签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宣告结束。面对持续“滞胀”的深重灾难,新自由主义打起了主张自由放任和私营企业制度的旗帜,发出反对国家干预的强音。在这种情势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沉痛反思,从曲折的历程中总结正反经验教训,得出被日后的实践证明相对成熟的结论,即国家只有遵循有限的适度干预原则,才能获得协调持续的经济增长。于是,他们放松对微观经济的管制,给私人资本以更多的自由,鼓励企业创新和竞争等等。与国家强干预阶段相比,政府有限度干预的显著特点是:政府间接干预取代了全面直接干预的主体地位。在这个阶段,市场机制重新发挥充分的自发的调节作用,计划机制只是间接地相机调节经济运行。时至今日,这种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一直有效地推动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相对健康相对标准的经济运行体制。

政府实行宏观间接调控的方式,各国情况不同,模式各有特点。目前世界上主要有5种形式:①美国为代表的模式,国家主要

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企业和家庭的微观经济活动则完全由市场调节。②北欧瑞典等福利国家模式,企业和家庭活动由市场调节,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采取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实施宏观调控。③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由政府制定中、长期计划和规划,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并通过政策加以引导,但不对企业直接下达计划。④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国家通过立法为市场竞争建立秩序,防止不道德竞争,同时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健全的公开制度保证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⑤日本的国家发展导向模式,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限制过度竞争,并与企业巨头紧密协作实施指导性计划经济。

## 第二节 我国计划经济的体制内裂变 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定位

计划经济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了与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较量。中国也于五十年代初加入了这场世界性竞争。经过几十年充分的发展,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计划经济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劣势。70年代末期,在内外冲突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的计划体制不可避免地发生裂变。从此,市场经济在狭缝中开始了曲折的成长历程。14年后,在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了合法席位并载入宪法,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也取得了明显优势。至此,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了历史性定位。

### 一、计划经济在我国的历史沿革及其体制内裂变

建国后,由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多种因素,中国选择了对后来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必然性首先来自中央高层领导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作为党的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

有,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在全体社会成员参与下来共同经营。这对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在实践上,苏联率先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并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就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前列的工业国,这就佐证了计划经济强大的威力,使这一理论成为指导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法宝;再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以命令、服从、纪律为核心的卓有成就的管理体系,毛泽东主席认定真理在最高层次归于统一,于是,具有深厚群众基础、顺应群众心理态势的集中命令体制就被驾轻就熟地移植到经济领域;第四,在当时一片战争的废墟上,我国既面临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经济的紧迫任务,又遭受国际敌对势力的严密封锁,加之经济结构单一,经济规模狭小,刚刚取得解放的全国人民又都渴望着人人有饭可吃,有工可做,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我国没有任何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我国基本上照搬了对我国友好援助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对于稀缺资源的配置,计划体制是这样运作的:首先,由中央计划机关收集有关稀缺资源的状况,生产的技术可能性和生产与消费需求的各种信息,然后计算出稀缺资源应当如何配置到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单位,才能取得最佳效益,最后根据计算结果编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把这个计划层层分解下达,直到基层执行单位。其中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充分地反映客观实际和执行部门能否正确、准确地加以贯彻就直接决定了这种体制的成败。因此,集中计划体制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需求、产品需求等拥有全部信息;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为此,计划经济必须做如下工作:第一,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收归国有,由政府官员直接配置;第二,社会的一切人力资源收归国有,由政府官员决定何

去何从,既无择业自由,又不能独立地进行发明创造;第三,消灭市场和关系,一切供求均由配给和调拨进行,所有经济计算都根据劳动时间进行,银行基本上失去作用;第四,一切价值(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工资、效率、汇率、房租等)都由政府管理,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要完成以上这些任务,就必须构建相应的政府组织,于是庞大的行政机构和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就不可避免,巨额的税务征收就势在必行,这样才能保证依靠纪律、服从和行政命令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这种体制下,经过全国人民长达几十年的共同努力,经济并没有获得持续高效的生长,远没有实现经过“计划”的各种计划蓝图,反而造成了长期的经济结构失衡,发展迟钝缓慢,人民温饱难续,在世界经济赛场上明显地日趋落后。单单就最近 20 年来看,我国的 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3 倍,日本的 GNP 增长了 17 倍,亚洲“四小龙”分别增长了 11—18 倍,连马来西亚、泰国也增长了 5 倍。1965 年日本的 GNP 还同我国相等,到 1985 年成为我国的 5 倍,再到 1991 年又跃进到我国的 9 倍,其它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得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如果更客观地考虑人口数量和资源状况,用人均国民收入来作一次对比,恐怕我们就更“惨不忍睹”了。

结论表明:实践结果与体制目标背道而驰。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拥有优越的社会制度、优秀的民族素质、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得不到起码的相应速度的发展?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从经济体制内反思并寻找原因,寻求良方妙策。

还是首先看看计划体制的运作方式有何弊端。第一,关于计划体制的信息机制。要保证资源配置的计划充分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等问题。当经济发展进入内涵(集约)成长阶段,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涌现并不断淘汰,人们的兴趣、偏好和需求在激烈变动的

经济环境中也发生稳定或不稳定的千变万化,生产结构也自然要发生极为迅捷的相应调整,面对如此众多的巨量信息,即使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做到准确迅速的收集和作出同步变动的高效处理,况且,经济始终处于恒定的动态变化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随时变化的信息及时地加以收集并作处理,此其一。其二,信息传输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纵向式结构,级级呈报,层层审批,结果是既不准确快捷,也不经济有效,这就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另外,对于经济计划的制定即对信息的处理,由于决策人受到知识智能和利益立场的负效影响,发生偏颇、失误和僵滞等等问题在所难免,这就使得信息机制的正常运转和效能发挥遭受阻碍甚至破坏,从而导致了经济运行的结构失调、效率低下和发展缓慢。第二,关于激励和约束机制。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保证正确的资源配置决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成为一个总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百万人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和执行者及其相应的机构除了不折不扣地完成社会交给的任务之外不能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否则就不能实现计划体制的初衷。问题是,在至少可预见的历史阶段,每个经济活动当事人都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追求,这就必然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如果单靠思想教育和精神鼓励的手段肯定无法化解这个矛盾,这就使得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与体制初衷发生难以避免的偏离,决然难以达到所谓“不折不扣”的要求,造成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失效。另外是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转全过程、全要素的强力支配,这就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张力形成冲突,耗能降效,严重地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扼杀了生命个体的生机、智慧和创造力,而且阻遏了其它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得整个经济失去发展的活力,萎缩不振。不仅如此,这种权力经济还造成政府职能的错位,社会职能的

紊乱,企业职能的丧失,本来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经济环境的正常秩序,保障经济、文化等其它事业的正常发展,结果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以政代企的状况,并由此导致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社会问题诸如养老、失业、医疗及保障问题本应由社会解决办理,结果也由政府包揽下来,有限的精力、财力终于再也难以支撑过多过重的额外负担了。企业的最大职能就是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日益丰富优厚的物质财富,而在计划体制下,企业只能是加工车间,只能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部件。既无明晰产权,更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只能机械地完成规定的任务,加之酬不符劳的分配体制,就越发使得企业萎顿,这就必然丧失以最充分地实现丰富优质的财富追求为行为目标的这一主体功能,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溃蚀,没有企业富于充分活力的发展,就决没有社会经济的生机、繁荣和实力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改革已别无选择。

问题既然由体制而生,改革就必须从体制入手。

既然计划体制的弊端首先产生于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运作的失效,改革就必须先从根治这一问题入手。

根据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果,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使资源配置优化,实现良性循环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道理在于,在短缺资源由千千万万个产权主体和多种生产要素有机组成的灵敏完善的市场体系配置的时候,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每个经济活动主体(个人或企业)都可以迅速地得到分散在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并由此自主地作出各自经营活动的调适,这就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中信息广泛而急剧的发生与要求集中处理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既经济快捷又灵活准确。其次各种资源配置的决策,由当事人作出,由当事人贯彻,由当事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自主执行,从而使个体的生命活力得到最充分的激发,使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地协调起来。

由此可知,计划体制的弊端根源,概而言之就是:违背经济规律,排斥市场机制。改革就必须坚定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根本原则。

计划经济经过 30 年的运转,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世界座次日渐滑落,它的理论和实践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在外界的强力冲撞下,计划体制发生裂变——承认市场调节积极的作用,启动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从此,市场经济踏上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征程。

## 二、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及其历史性定位

市场经济自从 70 年代末由计划体制裂变而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与传统观念、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阶层的顽强斗争,在充分地经历了由弱到强,由点到面,由理论到实践,由农村到城市全方位渐进式的发展后,于 1992 年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取得历史性定位。在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显示出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层次性。从更综合的观点去观察这一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启动期、成长期和定位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启动期。从 1978 年“允许市场调节论”的理论认可到 1984 年“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决议形成。市场经济最初发端于实际运行中的计划体制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内外交困,一方面是体制的现实水平与目标追求越来越相距遥远,内部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贫困,外部世界座次滑落,前景日益黯淡;另一方面,总是无法兑现的诺言日渐砍削着广大民众的信任心理,对体制的合理性、有效性滋生出种种强烈的诘问,积聚成越来越不满的消极情绪,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体制的群众基础。鉴于当时铁桶般的全面禁锢,所有企图对旧体制发起冲击的任何行动,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只能是失败。当时序发展到了结束“左”倾统治的开明时点,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牢笼以“蓄之既久,发之必速”的锋芒直指旧体制的弊端,敲开体制裂变的缺口,成为市场经济发生的逻辑起点。

问题的最早提出是在 1978 年 7—9 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

针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理论界在嗣后的讨论中把这一提法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是科学的理论在与错综复杂的改革实际发生了冲突时,自然只能妥协退让,在其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12月)仅仅提出了计划工作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五届人大二次会议(1979年6月)才提出了我国通过改革要逐步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以计划调节为主的体制,再到1980年有关改革的第一个政府文件——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文规定:“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是: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即便如此,客观现实仍难以容忍。在随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更改为: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里又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的提法。

在党的“十二大”(1982年8月)报告中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界定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并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以后,不同的提法基本上从报刊上消失,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主张的批评仍在继续,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告一段落。

理论与政策的发展趋于停顿,但改革的实践却以不可遏制的活力沿着商品经济发挥市场作用的方向前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事实证明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性、紧迫性,为恢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提供了物质生产的基础。

到1984年夏秋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位研究人员撰写并在一些老同志中分发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